

年秋天，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要求协和会各分会协助伪满各级政府推行伪满中央政府颁布的《产业统制法》。1942年又要求协和会各分会协助各级政府推行伪满中央政府颁发的储蓄政策等项活动。我虽然早已迈入行政机构，但对协和会的这些工作一直十分热心。1943年秋天，伪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开会时，我被请去发表演说，我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民族协和理论，阐述伪满政府与协和会的表里关系以及各民族互相团结、一心一意援助“亲邦”之战的重要意义。

1944年伪满政府又强制实行了粮谷的“报恩出荷”。其实当时农民们的“出荷”任务已经是力难承担了，但仍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出荷”量，因而导致许多农民以菜代粮，无法度日，无论乡村、城市饿死者不计其数。虽然如此，协和义勇奉公队仍毫不手软，到处“督励出荷”。我也于这年的12月当了伪经济部大臣，并一直兼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我在伪满洲国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一直担任着伪满洲国的重任，由此可见我在关东军和伪满政府中的地位。

（刘海璞整理）

伪满大臣于镜涛（节录）

高丕琨

从普通路警到中东路路警处副处长

于镜涛字鉴寰，1898年生于现在的长春市南湖公园附近一个叫袁家窝堡的小村庄。幼时念过几年私塾，上了高小，还上

过一段基督教会立的学校。以后托亲告友进了吉林省立哈尔滨甲种商业学校。于镜涛原名叫于大涛。在校期间（1918—1921年）带头和同学参加五四运动上街游行讲演，被警察逮捕。幸而经范俊夫校长营救保释，范校长将其名字改为了于镜涛，一直沿用至今。因此于和范校长之间的感情格外融洽，迄今难忘。于毕业后与另一同学王守先被铁路局督办派往铁路局料子厂任中队长，以后又被调到顾乡屯任路警分所长，由分所长升任第一段（哈尔滨）分段长。在此期间，正赶上张作霖派他的儿子张学良到东山里充任旅长，郭松龄为该旅团长，高纪毅为副官长。该旅给养都是就地筹措，因而该旅的军官常到哈尔滨来办给养，经常到段上落脚和住宿。一来二去和于镜涛混的挺熟，就有交情了。经伊等介绍认识了郭松龄、高纪毅以及张学良。张学良每到哈尔滨与当地头面人物应酬或互相宴请时总缺不了于。以后由于一段副段长升为四段（一面坡）段长，又转为六段（宽城子）段长。1925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恰值吉长道尹孙其昌推荐张顺卿当路警处长，因张不熟悉路警事务，拟物色一个适当的人充任副处长辅助他，就把于选上了。于由一个普通的路警、段长一跃而被提拔为副处长，可以说是旧官场中稀有的奇迹。于当然喜出望外。这个副处长于一直干到中东路出卖给日本为止。

1923年3月成立东省特区长官公署。朱庆澜为第一任长官。1925年朱辞职，由王书翰、于冲汉先后继任。1927年张焕相继任长官。因有少帅关系，于镜涛仍得蝉联路警处副处长职务，并兼任警官高等学校教务长（校长由长官兼任）。在此时，于每逢年节都到沈阳向张少帅汇报职务，请其栽培，少帅说路警处的差事待遇甚优，每月薪俸为600卢布相当于1800元现大洋，凯觐此职的则大有人在，你勿用他就可也等语。1928年

张作霖由北京撤回沈阳，在皇姑屯被日寇炸死。张景惠由北京回来后无职，经张作相关说张学良就把特区长官一职给了张景惠。路警处长和副处长的差事，本来由长官自行决定，而于与张景惠素昧平生，幸而少帅从中关照，得以再次蝉联了这一职务。

为什么少帅对于如此关注呢？原在于镜涛在旧官场活动中，有一套左右逢源，进退自如的本领。他从充任路警处副处长之职以来，颇得好评。况且于精明强干，善于人交，很有人缘儿，更有几个知心的朋友肯为其斡旋吹嘘。因为这伙人的直接或间接地帮忙，于镜涛的名字早已在少帅府中挂上了号，称他为青年中的俊杰。是以认识于镜涛的人以为他能飞黄腾达，予以瞩目。

张景惠当了长官以后，于不失时宜地殷勤趋候。并能承其意旨，妥善处理安排事务，特别是对张景惠的一些切身关键性问题，更能悉心探听研究，为其出谋划策，因此颇得长官的青睐与器重。长官又常以家务相托，虽纠纷复杂，于也能洞察其中的曲直是非，加以调解，所以其家属人等对于亦均信任无间。于对长官左右的官员和公馆的大小差役，亦能真诚相待，他们对于也有好感。所以于不论在官厅或公馆，可以任意出入无阻，与长官随时相见。值年节庆祝或长官寿诞，于亦能随众人跪拜如仪。于是长官门中的上宾，关系异常密切。从而有人传说于镜涛是张景惠的干殿下。

“九·一八”以后的张景惠和东省特区警备总队

“九·一八”事变当时张景惠先是观望，继而因有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密使，令张在不抵抗命令下，对日本要虚与敷衍、委婉周旋等情，于是张景惠才公然与日本接触（于说，密使是经

过于与张会面的，会面时于亦在座）。张景惠与张作霖是八拜结交的盟兄弟，他智勇多谋，为张作霖争霸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犹视之如股肱，以元老相待。蒋介石亦器重之，任他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作为笼络东北军的手段，以期统一全中国。日本人亦深知张景惠的出身历史，认为他有可为利用的价值，所以立为第一候补对象，不惜代价花大气力，拉张景惠上钩。日本先由大桥总领事出头与张景惠接洽。张景惠乘机提出希望日本协助成立一个警备队以保持与其他各方面势力的均衡。经大桥与土肥原、板垣协商，同意了他的要求，当即由奉天兵工厂给拨了4 000支步枪。于镜涛参与了此事。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的事情。

这时，于镜涛的意思是，必须把张景惠这个中心人物坚决地树立起来，让日本人不敢藐视他的存在，所以他完全支持张景惠这样做。张景惠把用日本发给的枪支组织警备队的任务交给了于镜涛。于没有辜负张景惠的委托，立即行动起来招兵买马。以警官高等学校现有的全部力量为基础，把可靠的有智慧有才能的全体教务人员及区队长等人组织起来定为骨干，并遴选网罗历届毕业生的优秀分子编为各级干部，定名为东省特区警总队。长官任命于镜涛为总队长，在总队下设立四个大队、一个警卫队、三个马巡队（后改为骑警队），各队长由总队长任命。全队定员为4 000人，总队部设在警官高等学校，大部分驻在王兆屯、顾乡屯、香坊、新安埠（偏脸子）等处。招募兵士由各大队负责，分别设立募兵站。当时社会上闲散无职的青壮年较多，听说警备队招兵，应募者非常踊跃。很快就共计招募了近4 000人，在各大队长的监督下，由各级队长负责编队造册。由分队长亲自对新兵进行训练。分队长以上的官员皆为警校学生出身，有的当过军官。总队长于镜涛每日轮流到各队巡视，对

官兵讲话冠冕堂皇地告诫官兵要上下一心遵守纪律，学好军事本领，成为国家的干城，在非常时期为保持地方治安社会秩序出力。还以身示范亲自教战士学习操典。平素大队长在各大队分别操练演习，常试作分列式。1932年后，总队长请长官亲临阅兵。集合总队于一处由第一大队长为指挥官进行分列式兼作小规模演习，也有骑兵和小炮参加。总队长于镜涛陪长官张景惠阅后，长官甚为满意连连说：“好！好！”

这是一支装备相当齐全，武力比较强大的部队。由长官直接领导支配，可以说是张景惠自身可靠的武装力量。该队经费初由长官公署接给，后随着张景惠任伪军政部长则移属于军政部，经费亦由军政部支给。最后隶属民政部，经费由警察费支给。

警备队究竟干了些什么，起了什么作用？按着于镜涛的说法是：

第一，保护了张景惠的人身安全，坚定了张景惠当汉奸的决心，帮了张景惠效忠蒋介石和日寇的大忙。

第二，对于地方治安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警备队的官兵纪律比较严明，老百姓也不太讨厌。给长官公署及其他机关、公馆站岗守卫都肯认真负责。

第四，为张景惠去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省长和会见马占山，特派两个中队（200人）执行警卫任务。

第五，当1932年哈尔滨松花江发水，市区一部分被淹，警备总队对防汛与救护，都作了一些工作，博得官民的好评。从而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的重视。同时，日本驻军和日本宪兵队也知道哈尔滨有个警备总队了。所以警备总队才得以苟延残喘地存在下来。

哈尔滨警察厅的成立与警备总队的改编

警备总队隶属于民政部后，警务司认为该队机构庞大，人员过多，从1933年4月起遂将该队定员缩减到2500人，并改称为哈尔滨特别警察总队，于镜涛照样当他的总队长。

与此同时警务司也改组了东省特区警察管理处。原来，哈尔滨市区有三个不同管辖的行政机构，傅家甸（道外）和太平桥归吉林省滨江县管；江北的松浦镇归黑龙江省呼兰县管，其余的都归特区管。此次归伪当局拟将以往这些管辖不同的机构统一划为哈尔滨特别市，归伪中央直辖，按市的区划，将不同管辖的警察机构也统一成立一个新的哈尔滨警察厅，归伪中央直辖，并决定任命原特警处长金荣桂为哈尔滨警察厅长，东省特区改称为北满特区，将现特警处所辖的中东铁路沿线所辖的警察归北满特区警务处，预定从1933年10月1日起施行。

在此计划未施行以前，发生了一件与于镜涛的警备总队有关的插曲：大约4月间，特警处长金荣桂向日本特务机关长小松原道太郎大佐进行汇报时，小松原向金荣桂说将警备总队归属于将来的哈尔滨警察厅，你意下如何？金荣桂这个人奸滑，不肯表示意见，只说我听从上级的安排，我服从机关长的决定，我没有意见云云。他们说话作翻译的就是笔者（笔者当时兼任特警处秘书），警备总队的将来与于镜涛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于，于镜涛当即找警备总队副队长坂本。坂本是警务司派来的，是预备役陆军步兵少佐，为小松原大佐在士官学校的同期生。于的意思是请他到警务司疏通一下，过了两天，听小川松雄说坂本到特务机关向小松原大佐汇报了此事，小松原闻言之下，殊为震惊，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坂本就把笔者给金荣桂作翻译的事情说了一遍，小松原机关长对此很

不满意。小川说，此事非同小可，对你很不利。我也感到他们如果将以我泄漏机密论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小川松雄是预备役日本炮兵大尉，为老于所请的总队的顾问，和坂本有矛盾。小川在特务机关也有认识人，常到机关打探消息，偶尔亦有所获。最后我们商定由老于即刻到特务机关找道满三郎当翻译，见小松原机关长进行解释，请他谅解。道满三郎是特务机关的中文译员，是北京私立中国大学毕业的。早在北京与笔者相识，是很要好的朋友，今番异地相逢，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觉得分外亲切。老于见道满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道满一口承应下来，老于能说善道，道满又从旁加以美言，当即得到小松原特务机关长的谅解。小松原表示这是他向金处长的试探，根本没有把警备总队隶属于将来的哈尔滨警察厅的意图，请老于幸勿误会和介意。他倒向于道起歉来了，经过这一番解释，还真把警备总队的归属问题给解决了。我托大家的庇护，幸免了一场灾祸。

警备总队总队部的官员，大队长和中队长大都是从总队长多年的同事或警官学生中选拨出来的，也有是特殊关系请来的，各大队的文书、书记（管杂务的）和分队长，则是由各方面（包括大队长在内）的推荐或本人自荐经总队长亲自考查合格，才发给有总队长签名盖公章的委任状，到任以后总队长还要继续直接间接地进行考查，按每人的实际成绩随时调整或升迁或斥退，所以这个队是以总队长的意志行事的。关于队员的任用撤换调迁，总队长于镜涛握有绝对权利，不过，他自己也有定律，好像也不乱搞，因此他有威信。据我所知，他未曾一次无故更换过大队长。所以他和队员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正常的，可是各干部之间有时也闹摩擦，例如为争好差事或夺功劳，都勾心斗角各不相让，有的向总队长传消息借题发挥，说长道短。

有的人递条陈述说其父母死了，或孩子有病，需款甚急，请

总队长借支。说话间声泪俱下，总队长便批准暂借给50或30元，到会计科支款。此款即或能扣（从其工资中），但扣了还借，有的简直就是告帮，像此等事月中总有几起，此类款项不可能从公费里报销，最后都成了总队长的债务了。

会计是总队长的亲信，警备总队的会计方蕴奇字佩文，安徽人，1896年生，任总队会计科长。我是总务科长，与会计有些瓜葛，为事务联络我常和老方接头，他以为我是总队长的亲信，因此会计上的秘密也不肯我，我故意问他，总队长常批条子借支，你能在公费内给他报销呀？他说由总队长所得中扣，我说他的月薪够扣的吗？他说岂止这一点，另外总队长的应酬花销也太多。我说不是有宴会费吗？他说没有宴会费的预算，总队的机动费也有限，我说他赔得起吗？他说哪有自家拿钱赔的道理！原来这里另有门道，老方说总队定员为4000人，其实连1000人都不到，我体会到这叫吃空额，是旧军队的通病，总队长吃大数，各大队长吃小数，这是公开的舞弊。方还说，咱们队所住的房子都是铁路局的，燃料费都由铁路局开支，这笔薪炭费可以值得，只需要作一个报销单据就行了，老方对这些是行家里手，在帐簿上作的天衣无缝，搞不出丝毫破绽来，平常都是从这些外快中开销总队长的一切应酬和意外的花销，我算了一下这些钱至少有10000元。除了他的家中消耗，恐怕所余就无几了。还有一件事，就是警务司把警备总队4000人减缩为2500人这件事，却给了于镜涛一个发财的机会；对被裁者每人发给3个月工资的退职金，要裁减的为1500人与空额的人数相差不大——最多不过400人，就是说于镜涛可以得到1100人的退职金。按每人每月工资平均12元计算每1人可得退职金36元，1100人的退职金为36元乘1100，共计是39600这个数目非同小可。总队长当然不能独吞，对有关人员作了恰当的分

配。事后会计科长给我送来以我名义的2 000元（哈洋）银行活期存折。这些事都在方会计科长亲身秘密地布置下进行的。当时在总队部共有4名日系官吏——坂本副队长和淀屋经理官，另2名是小职员。他们以为裁员是不得人心的事，不愿过问。各大队根本没有日本人，其中的实情日本人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警备总队自改属警务司后，日伪当局即派来日系军官坂本副队长（单身）和淀屋经理官（携眷），还有两名宪兵出身的日本人。在警备队成立之初，老于曾聘请两名日本顾问，一名叫小川松雄是日本退伍的炮兵大尉，会说俄语，另一名叫富永是个浪人，好像无赖，会说中国话。自警备队归属警务司后都自然解职了，小川任伪满哈尔滨专卖（鸦片）署缉私科长，后升副署长，富永去向不明。

坂本、淀屋来队后，企图把揽权柄，但未得逞。于镜涛对日系官吏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还时常施以小恩小惠。但对于公事，毫不含糊，决不让他们渗透，只让他们对职务多加帮助指导。坂本以为这些都是我帮助于作的，所以内心恨我，但无计可施；正赶上我把特务机关长的话传给了于，便乘机向特务机关长悄悄地汇报了这一桩事，打算把我整掉。

自从伪哈尔滨警察厅成立后，警备总队（即特别警察总队）的存在受到威胁和排挤。这是因为哈尔滨市内的治安完全由伪哈尔滨警察厅担任。以往由警备总队为各机关、公馆所出的警卫也逐渐为哈警的警察队所接管。于是经伪满当局和哈尔滨特务机关协议重新明确规定了两机关的分工。警备总队的任务是专管市接壤地区治安工作，换言之，就是专管威胁哈尔滨市区土匪的讨伐工作，根据侦察到的匪情或遵命会出动部队进行讨伐。后来，讨伐工作逐渐减少，警备队没什么事可干。警务司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把警备队的上级官员次第地抽出，分

别任为县市的警务科长（公安局长）或警察署长（公安分局长），下级士兵则派为行政警察。到1935年警备队缩减为600人，改称为哈尔滨游动警察队，仍由于镜涛充任队长，驻在牡丹江、东宁等国境地带。顾名思义，游动警察是游动的，不是固定于一处的，属于特殊性质，须受当地驻在日军的指挥监督，负有保卫国境的责任，监视苏联的活动，也和抗日联军打交道，至此该队增加了很多的日本人。于镜涛也感到事情复杂，心绪烦乱，所以很少到现地，长期住在哈尔滨，由副队长代理队长职务。直到1936年伪哈尔滨警察厅长金荣桂任伪首都警察总监，伪满任命于镜涛继任哈尔滨警察厅长。约在此时，伪满新公布了一个国境警察队的官制，淘汰了游动警察队。对原有该队的所谓满系队员除自愿退职者外，一律按原有职位分别转任为一般的行政警察。至此，于镜涛秉承张景惠的意旨亲手创建的警备总队经历了几个过程，终于完全彻底地无影无踪了。这就是警备总队的结局。

哈尔滨慈善总会

这个慈善总会是于镜涛发起的，也是他出力出钱操办的，可以说是他心血的结晶。他说，中国到处都有穷人和叫花子，哈尔滨也不例外。特别是在1932年松花江发水，哈尔滨市内一部分被淹后，难民穷人更多了，往来稠密的街路上几乎都可以见到叫花子。哈尔滨号称国际都市，观瞻所系，不但有碍市容，也内藏着治安上的隐患。若是传染病一蔓延那就更不好收拾。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指那时）我们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如不及时设法，那怕是治标的办法也是迫不容缓的。他宴请了当时所谓地方上的有力者数十人研究成立慈善会。当时参加宴会者都写了认捐数目，是一笔相当巨款，大概

有2万余元。参加者有：张凤亭（双合盛火磨主人），徐鹏志（酒精工厂主人），郭云阁（英美烟公司经理），李墨林（益发银行经理），姜祝三（恒泰银行经理），吴子厚（资本家），吕泰（资本家），蒋洁珊（资本家、名流），姚锡九、刁子明、杨贯三、李仪亭等多人。公推吴子厚为会长，选副会长若干人。其他都是董事。选于镜涛为监察员，监理一切。决定李仪亭为代理会长，刘忠国为干事。临时在军官街0号设办事处。并陆续收容一批老幼难民给衣食。可是内中有的叫花子住些日子后企图外逃。遂加上岗哨，以防外逃影响治安。以后办起了样子加工厂和木工厂。于镜涛还请哈尔滨的伪满显官参加慈善会，予以襄助。我记得金荣桂在慈善会正需要钱而没有钱的时候，曾说：“善门难开，善门也难闭啊。”于镜涛就任伪哈尔滨警察厅长以后，仍关心并竭力维持这个慈善会。例如有的企业家想创办事业时，求于帮忙，于就乘机动员他向慈善会义捐；他赚了钱要酬谢，于也让他送给慈善会以襄义举。于对慈善会也算煞费了苦心。不过听说李仪亭（李三爷）和刘忠国（刘贤忱）这二人都是口唱“阿弥陀佛”而是“大洋归我”的一类人物。监督虽严，也有物议。可是吴子厚会长为慈善事业，甚至将身家都投入了，可惜此人未能永寿。

“广交朋友”

伪满官场上有些人认为，于镜涛为人和气大度，与人交言而有信，对同人一视同仁。他认识的人之中，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大家称于是海交。据我所知，和他来往办事的人真不少。资本家有张凤亭、徐鹏志，事业家有李墨林、郭云阁，包工出身的有吕泰、杨贯三，有名流专家，甚至富而不仁的姚锡九他都认识。显官达吏，贫困的皂吏和工人也认识，并有来往。

社会上许多棘手的事，找于也可能解决。聚于他们下的多数是为求个一官半职的，还有借大树好乘凉，作保护伞的。不单中国人，外国人也有，如白俄找他安排工作，他也尽力而为。伪满时日本人找他，他亦不拒绝。常到他家来的有老上司、旧知己、青少年时代的同学和及门弟子。他的学生中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其中尤以国民党袁功瑾、共产党周维斌为突出。二人由警官高等学校毕业成绩优秀，留校助教，后转警备队，于派袁为差遣员、周为侦缉股长。二人的工作范围广泛，颇有活动的余地，我想这可能是总队长洞悉其境遇，才考虑任命的。伪满根本不准任何党派活动，而袁、周二人就以此为掩护而隐蔽起来了。警备队出队讨伐，皆以侦缉股的情报为依据。我相信周维斌决不能以抗日联军为对象而立讨伐计划的。不过这两个人都有阿谀奉迎，常到太烟馆同榻对灯举枪而过瘾。我本以为二人以此为麻痹大众而故为，其实不然，他俩真就沦下去了。二人的政治背景我是间接听说的，于亦明知不说而已。周维斌有一次夜闖在饭馆醉后，将盘碗砸碎，被当管警察署拘留，有人向我报告，是我打电话找其署长（日本人），以赔偿饭馆的损失为条件，把他保出来的。

当时，官场上的人都说于有度量，如被他撤职的人，以后又任用了。有人以“宰相肚里能行船”来讽刺他。我给他念过一首古诗：“世人结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一时暂相谄，终是悠悠行路心。”于是那时候没有钱活动不开，都是向钱看嘛！于最失意的一段时期是任哈尔滨游动警察队长，可是，家中还是不断人，我也常去。以后不久，他又任伪哈尔滨警察厅长，接着升首都警察总监，又滨江省长，特任奉天省长，直到国民勤劳部大臣。可谓扶摇直上，官运亨通。这时期，新交故知皆绕于于的周围。于好交朋友，远近驰名。当时伪满中央国

务院和各部的满系青年骨干分子科长参事官等都敬仰于镜涛，愿意认识于镜涛，形成了但愿一识于镜涛的气氛。于镜涛如有事，只要派秘书去接洽没有不成功的。于之所以能得到多数的拥护和有所成就，当时我以“泰山不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厌细流故能就其深”来加以说明。可惜他走错了路。日本人认得于的如松本益雄（张景惠秘书）、大藤传治郎（臧式毅秘书）、道满三郎（溥仪翻译）等也交口称赞。连武部六藏（伪总务长官）也说于镜涛有人缘。

刘翼飞当过察哈尔省都统（督办兼省长），为张少帅的亲信。刘曾在哈尔滨任旅长，为于镜涛的知心朋友。于的父亲在蔚县任税捐局长就是刘安排的。刘有一所住宅在哈尔滨马家沟（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房四周还有园地），无端地被日本人没收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对旧东北官吏和军人所有的动产、不动产，采取一律没收的政策。刘翼飞的这所住宅亦在没收之列。于觉得在他的眼底下，把老朋友的住宅给没收了，太对不起老朋友了。遂让我打听办此事的是什么人？经我了解到，日本人设了一个所谓逆产管理委员会，归日本特务机关领导，派一个叫角田（名字已忘）的日本人负责办理。经道满三郎介绍，我认识了角田。角田年近40岁，是一个浑浑噩噩的男子，人颇热情。我说“于镜涛想拜访你，让我作一个先容之请，他有事求你，于的朋友有所住宅被没收了，内中有些出入，想请你费神给核实一下。”角田说：“你再详细地讲讲好吗？”我说：“我只知道这些，详细的老于和你亲自说明。老于叫我约你请你选一个你认为方便的时候，他准备便宴，边饮边谈，看你能赏脸吗？”他说：“随便哪天晚间均可。”我在哈尔滨日本高级料理“武藏野”订了一席，以于镜涛名义请了角田和道满。下午6点，我们开始聚会，吃日本菜、喝日本酒，还叫了三名歌妓作陪。开

怀畅饮，气氛非常融洽。于说：“我的朋友现在在北京作商业，很不景气，他想回哈尔滨，房子是他妻子的名字……”道满从旁也帮着说情说：“似此种情况，有充分理由，可作为非逆产论处。”角田说：“我回去和大家研究，再作定论。”以后，于又在家中请他吃酒，和角田关系搞得很好。我和角田在交往中得知他喜欢竞马（赛马），特别喜欢养马。于在特务机关号召养马时曾买过一匹马，加入赛马。骑手是日本人。角田认识这个骑手，他听说于这匹马好，甚为羡慕，总在于面前夸这匹马。我劝于把这匹马送给角田。有一天于说：“我只会骑马，不会养也不懂马。我想把我这匹马送给角田先生，中国自古有向朋友赠马之美谈，关羽的赤兔马就是朋友赠给的，我这点区区微意希望角田先生幸勿见却。”角田再三推辞不肯受，经于再三恳切劝解，他才收下。角田曾向我表示过愿出代价割爱此马。于的马是200多元买的。这样角田很快把房子还给了刘翼飞的妻子，新房照是老于的夫人蒋洁珊的名字。当时，房子价钱不高，故未即时出售，又过了几年，房子起价。刘翼飞正在北京赋闲，手头拮据。于是把房子卖了1.2万元，经赵佛印（刘的旧部）的手，悉数给刘翼飞汇去。于又令我给刘的夫人蒋洁珊要回一所房子。当时伪满官场上，人们都说于仗义疏财，为朋友办事，急人之难。

日本之行

于镜涛任北满特区警备队总队长时曾向警务司长长尾吉五郎提出欲访问日本的希望，立刻得到他的同意。遂于1934年4月初束装就道。由长春乘直通朝鲜釜山的列车，作过一次朝鲜日本的旅行。随在于镜涛旅行的有高丕现（伪哈尔滨警察厅警正兼警备总队总务科长）担任翻译，尚魁五（警备总队差遣员）担任扈从，东丰（日本人警备总队队员）担任杂务。于此

次去日本既没有任务也不负任何使命，完全是观光游览，借鉴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解日本，因此没有规定到什么机关访问，也没有事先发介绍信。只拟定了一个旅行日程表，是作自己参考的。

首先到朝鲜平壤。访问了平安北道警察部长（日本人），是哈尔滨警察厅伊藤容宪科长介绍的。于受到警察部长的殷切接待。警察部派一名警部（警佐）特出一部小汽车带于饒涛一行到各处游览参观。

于在朝鲜还参观了一所普通学校（与日本人的寻常小学校同），都用日语讲课；日本侵略者规定日语为朝鲜国语；其使朝鲜人完全同化为日本人的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朝鲜有个箕子墓。《论语》上有“箕子为之奴”这句话。历史记载，箕子为殷之太师，纣王无道，箕子讲谏，纣王不听而囚箕子，箕子佯装癫狂而为之奴。武王灭纣，箕子率5000人避于朝鲜当了君王。以后高丽王肃宗，命人搜访箕子之墓而祀之。就是这个箕子墓。我陪于去游览时，见参观者络绎不绝。可是此墓并无特殊的设施和陪衬，根据那里供奉箕子神像的衣着，酷似现在朝鲜人普通的穿戴。

经介绍，于怀着比较浓厚的兴趣参观了妓生学校。日本人说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所叫妓生的学校。这所学校历史悠久，早在李王时代就存在，专门培养宫娥嫔妃、歌妓舞女，供国王娱乐。日本人把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到大宾馆饭店作歌乐或侍女。有的成为歌手、舞女或名妓，有的则沦落为普通的妓女。不过在社会上一提到某某是妓生学校出身，人们都高看她一眼。我和于在某饭店得晤妓生学校出身的二三妙龄女郎，真是别具风度与众不同，不但能歌善舞，日语也讲的呱呱叫！

汉城，当时叫京城，是朝鲜总督府所在地。总督府是日本

统治朝鲜的最高权力机关。当时的总督叫宇垣一成。于镜涛投刺访问时，把张景惠问候的名片交给他，他也亲署一张问候的名片请于转给张景惠。宇垣是日本陆军大将，曾任陆军部大臣。他听说于此行专为观光而来，当即找来负责人给作向导，参观总督府及旧李王府，最后引导我们到南山。南山是镇护王城的“圣地”，内有朝鲜神社，祭祀天照大神。

经在哈朝鲜名流金松殷的介绍，于镜涛访问了京城市的一个新闻记者（朝鲜人，姓名忘记）。这位朝鲜记者设朝鲜式酒宴招待于。当晚，于在中国饭庄答谢了他的盛意，尽欢而散。

几天后，于一行从京城乘车到釜山，当夜即换轮船，第二天早晨就到了日本下关，由下关乘特号快车直达东京。

当年，凡到东京的日本人必须到宫城礼拜于。于说：“我们也到宫城去。”据说三重桥的皇宫（即宫城）称为皇宫。我们虽然只看了外貌，但也感觉到名不虚传。随行的日本人东丰宣扬：“于总队长礼拜宫城了”，日本人都称赞于的“心好”。

这时候，伪满已派丁士源为驻日公使（后升格为大使）。于为走过场拜会了丁士源。丁士源对我们讲：“日本的维子（柔道）、剪子（剑道）好，我们要学。”他讲的是福建话听不懂。他的意思就是说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我们需要学习。根据孙错（是我的同乡）说，他在日本外交聚会中闹了不少笑话，人们叫他丁疯子，不得人心，不久就下台了。

于镜涛一到东京就拜访了东京朝日新闻社。第二天报上便登载了于一行抵达东京的消息。结果于在东京的老朋友纷纷来访，我的老师在霞关外务省工作的森政忠也来了，在日本内务省警官讲习所留学的伪满学生也来了。请我们吃饭的姑且不说，于却特设宴招待了这伙留学生，与他们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东京可游玩的地方很多，公园、夜市以及繁华的商店街，尤

其引人入胜。还有神宫、神社和寺院等，参拜的人往来不绝。这些地方我们都去了。

日本的资本家和有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是穷人或生活不富裕的。从社会的现象和日本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就可以窥出一斑。日本是一个不设公娼的国家而实际上却是有公娼的。如游郭就是花柳街，东京的新宿是有代表性的妓馆所在地，真是勾栏林立，游人如鲫，招揽游客的牛太郎（大茶壶）站在显眼的地方，用花言巧语，招揽生意。他们不分国籍，来者不拒，看穿洋（西）服的叫洋先生，见穿和服的叫和先生，简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也曾陪于镜涛到此观览。

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地方，那就是“玉之井”。“玉之井”是最下级妓馆所在地。“玉之井”好像北京早年的“玉皮胡同”和长春的“新天地”；比这些地方还不文明。我虽去过东京三次，也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这次我是随着一个在东京留学的伪满警官去的，以我来说等于新发现。“玉之井”在玉之井车站附近，方圆不小，总有百十户娼家，每家都拥有不少十七八岁的姑娘。开妓馆的为赚钱，穷姑娘为吃饭，把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态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真是人类的耻辱。当时日本号称资本主义文明强国，这仅仅是其阴暗面的一部分。从“玉之井”回来，我向于介绍了这些事情，问他有兴趣去看看吗？他说怪不好意思的，别去了。

于镜涛在日本时，用了多半天时间参观了东京警视厅。这里的最高长官叫警视总监，为日本内务三长官之一，地位显要，随着内阁的变动而变动。日本最重视警察行政，而警视厅警察人员的素养和设备的齐全，为全国之冠。于带来的到警视厅的介绍名片很多，都分别作了访问。最后由警务课长为向导，参观了警视厅的特殊设施。主要看了他们的剑道柔道训练和演武

场与搜查犯罪的设备。有一面镜子是照犯人给证人看的，证人能见着犯人而犯人却见不着证人。他们搜查罪犯或嫌疑者，不用刑讯，使用科学的搜查方法，如利用指纹保持犯罪现场，或利用催眠术、精神疲倦法等及依靠群众追索旁证等方式方法进行破案。总之，重视证据，不用酷刑逼讯，已获得相当的成效。所有的警察都由警察训练所毕业，有的下级巡查还是帝大毕业的法学士，至于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更比比皆是。

于镜涛还带我们参观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待于的是士官学校的干事东条英机少将。以后不久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兼大使馆警务部长；经关东军参谋长出任侵华兵团司令；在近卫内阁中任陆军大臣；于1941年10月，继近卫内阁，任总理大臣，一个时期兼陆军、外务、内务、文部及商工各部大臣，集文武大权于一身。就是这个东条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败战后，企图自杀未遂，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仍然为他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战争狂人，卒被判处绞刑。当年的东条瘦高个子，近视眼。向我们介绍了士官学校的沿革和办学目的以及毕业生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和社会上的地位。他讲的有声有色。随后带我们参观校内设备。

于在东京期间还乘车去风景胜地日光游览，然后去名古屋。

于带着北满特区通口总务处长的介绍信访问了名古屋市社会部长。社会部长亲身陪同于参观了有关社会事业各种设施，还赠送很多照片和参考资料。他们对于有残疾的和老幼无依的人都有详实的调查数字，或安置就业或给以救济。设有缝纫、食品、编制“他地迷”的工厂等。据社会部长说，名古屋市无一乞丐，盗窃案件也非常少，为当时日本各都市之最。午间，社会部长特设便宴招待了我们。临行时，于特向名古屋市社会事业捐款日金50元以表关切。老于介绍了他参与哈尔滨市慈善总

会的事情，希望部长到满洲国时千万来哈尔滨予以指导，请到他家作客等语。于观后对我说：“多咱，咱们的社会事业办的能赶上人家啊？”

京都都是日本的古都，亦称西京。于镜涛到京都时，这里樱花已过盛开时节。到岚山只是晚景了，但还有三五成群的游人，携酒席地而坐，传杯助兴。于领我们参观了御所，御所是明治天皇以前的宫殿，饶有历史风趣。还有33间堂和知恩院等名胜古迹，来京都的人莫不一睹为快。当我们走在33间堂等画廊中，听到解说人员的喊声，这是莺之间时，随着步履，地板上就发出莺啭之声，悦耳动听，至今思之，仿佛犹在耳畔回荡！

日本人多信仰佛教，我们所经过的市镇，没有一处无寺院，其礼佛之风甚盛，亦十分虔诚。日本的佛教徒一般不禁止结婚，可以成家立业。西本愿寺的长老是天皇裕仁的妹夫，官位很高，吃国家的俸禄。其佛教宗派甚多，据我所知，有真言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真宗、天台宗等，唯天台宗的教徒和中国的佛教徒相同，出家修行，终身不娶。于镜涛对佛教，特别对天台宗很感兴趣。他听说在京都附近的滋贺县比叡山延历寺是天台宗的大本山，便不憚劳累特雇一汽车，沿琵琶湖畔长途驱行200里亲到延历寺去访老和尚，他本心是为访白云法师，不幸未遇，败兴而归。然而，于由京都到奈良东大寺参观，该寺的大佛大得出奇。记得他的手指有大人胳膊粗，胳膊有普通人的腰粗。于访问寺院的和尚，但话不投机，也没有缘。遂到春日公园去观驯鹿。

于在大阪观看了宝冢歌舞剧。大阪是宝冢歌舞的发祥地。剧团由上千名少女组成，规模相当大。看演出需提前预约票，临时不易买到，我们四张票还是托人买的。宝冢歌舞是群歌群舞，出场的少女舞得花样绮丽，新颖多彩，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

接。歌声嘹亮，婉转动听，使人心旷神怡！从大阪到神户，于又带我们参观了日本造船厂和火柴工厂。

到广岛，于首先参观了广岛文理科大学，是原广岛高师升格的。在日本仅有两所男子师范大学。另一所是东京文理科大学，是原东京高师升格的。

广岛与九州四国相望，滨濑户内海，是本州西部的重要都市，为旅游胜地。日本三景之一的严岛就在这附近。于一行由一个日本朋友作向导乘汽艇到岛上游览，严岛在濑户内海之中，四周风光旖旎，非常漂亮，碧海荡漾，银浪叠起，格外绮丽，海鸟高翔空中十分惬意。蓝天与白云映入海中，真是水天一色，别有一番风趣！于玩得十分痛快。

由此乘船顺濑户内海一直到九州门司，专程访问了一直在家养病的松本益雄。在门司少作逗留即作别府之行。

别府，号称泉都，是出名的温泉胜地，于在一个日本式的温泉旅馆投宿，可随时入浴。其间，于曾带我们到紧挨旅馆的一所温泉别墅游览，这里可以休息下围棋，可以宴会便酌，更可以为游客召喚幼姬陪酒助兴。谢绝不了馆主的再三怂恿，我们也召喚三名幼姬，留她们陪酒。她们不会弹唱歌舞，只给连连斟酒，让她们陪饮却再三筑篱，含羞带愧，似有难言之苦。斟酒助兴每人1小时1元。于在温泉旅馆住了两天以后，又重回门司，向松本致别，乘渡船到下关，从下关乘轮船到釜山，当即搭“光”号快车回到了长春。于为期五周的日本之行圆满地告以结束。

松本益雄

在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于饕餮旅日时曾专程前往拜访的松本益雄。松本，1895年生，上海同文书院（日本立的）毕业。毕

业后任日本外务省官吏，派充驻中华民国上海、广州、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等职。长期与中国人打交道，熟悉中国的人情风俗和习惯，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他在中国南方曾与陈济棠、李济深等人有过来往，是个中国通。他在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任书记官时，经人介绍与于镜涛相识。以后在外事活动中，二人逐渐相熟。“九·一八”事变后，他向于关照说：“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当时适值于的唯一男孩患猩红热并发白喉，病势凶恶，窘迫已极。松本出而为之延请日本医生予以治疗，遂遏其病势。于对松本的义气，且佩且感！自此以后交情愈笃。松本向大桥忠一总领事介绍于之为人，说于有作为，与一般中国人不同。于通过大桥又和日本军部参谋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接上线。后来大桥、土肥原、板垣三人又通过于镜涛结识了张景惠，是松本当的翻译。此后，松本奔走于大桥、土肥原、板垣与张景惠之间，作联络工作，为促成张景惠投靠日本费尽心力。伪满建国后，松本患病，经医确诊为肺浸润需要转地疗养，他才回到日本门司。厥后，松本与于镜涛之间，音信互通，往来不断。松本是松本家之养子，松本是其妻之姓（他的本姓我们不知道）；松本之母（岳母）因病早逝，近年又丧妻，而今只是父子老少两个鳏夫而已。家门不幸，冷落之情，盖可想见。老松本是门司市议会的议员。松本在家养病，于镜涛时常汇款慰问。于访日又专程到松本家探望，特送慰问金一封；对于之真情实意，松本不好意思推辞，只有铭感耳。我们到门司时，松本之病基本上已好，能自由行动。及1935年5月张景惠继郑孝胥任伪满国务总理时，松本已完全恢复健康。于镜涛推荐松本给张景惠当秘书官，当即得到张本人和伪政府的同意，松本就任了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荐任秘书官。松本身材虽短而其心胸不小，不仅有外交家的手腕，还善于为

张景惠出谋计策，张景惠得了松本真如鱼得水。与日本人之间，折冲樽俎，使张景惠能获得日寇的信用，保持伪总理的职位到最后，这与松本的辅佐分不开的。而于镜涛也跟着沾了大光。于镜涛得到日本要人的信任，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这也与松本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以我多年的观察得出一个结论：“他俩不是手足胜似手足”。下面一个小事，足证松本对于的无微不至的关切。有一天松本管张景惠看公事。见到警务司请调令，调哈尔滨警察厅事务官高丕琨任首都警察厅理事官充卫生科长的文件（伪满政府荐任官以上的任免调迁均须总理批示，文件到关东军第四课最后决定）。松本了解于和高丕琨的关系，所以当即叫通长途电话知照于应如何办理。于得到通知，即到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见安藤麟三少将机关长（小松原大佐已转出）说明此事，并说哈尔滨警察厅有必要暂时不同意将高某调出等情，请机关长费心解决。安藤少将一个电话打到关东军第四课，就把警务司这个调令取消了。后来，警务司人事股长佐藤太郎对我说，我们执行公平政策调升你为首都警察厅卫生科长，于镜涛以国家官吏为私兵，只为一己方便，置国家于不顾，殊属不当云云，言下大有不满之慨。可是于又升为警察总监了，升省长、升大臣了。还是上边说了算，这有什么办法呢？于镜涛升官固属于他本身具备符合日本人要求的条件，而松本为之奔走斡旋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松本由荐任秘书升为简任秘书是于镜涛对张景惠疏通的。原来伪总理秘书中有一个简任的定员，规定由满系（中国人）充任。按松本的资历和本领，把他安置在任何职位上充简任官，都是绰绰有余，当之而无愧的。现今这个简任秘书官出缺了，于说这个简任秘书官就给松本，松本那个缺叫高丕琨来干，得到了张景惠和伪政府的同意，就这样，决定提升松本为简任秘书官，工资也随之提升，松本一直干到伪

满垮台。

哈尔滨伪警察厅长

于镜涛就任哈尔滨警察厅长，虽然说是新任，但哈尔滨这个地方的情形他全熟。了解了地方情况，事情就好办。警察厅的副厅长、各科长、督察官、警察总队长以及各警察署长，他都接触过，有的还有交情。伪警察听说于总队长当了厅长，都拍手称庆。特别是我从三年前就兼前任厅长金荣桂的秘书，以后任命警察厅警正担任厅长秘书，可以说是于的先遣队员。于任厅长后，我把我所知道的警察厅副厅长以下各主要干部以及各科署概况，特别是关于日本人官吏的情况和前厅长金荣桂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对日系的方法、态度，都向于镜涛作了介绍，作为今后执政的参考，所以于对我寄予莫大期望。

于到警察厅以后，还是老规矩：仍然是厅长高高在上，无所事事。除有重要公事副厅长与厅长见面商谈外，其余例行公事厅长盖章就行了，无用脑之处。

1936年7月伪满警务司通报全国各地伪警察机关说，建国初期有土匪（指抗日军）30万，经历年讨伐扫荡已打死10万，据可靠数字尚存10万，就是说另外10万都分散隐蔽起来了。其中有的为非作歹以偷盗强劫杀人放火的普通刑事犯罪形式出现，还有的潜入社会内部，煽惑群众进行反满抗日活动，成为特务警察的对象，扰乱社会治安，所以必须强化刑事警察和特务警察工作。然而哈尔滨警察厅究竟检举了多少刑事犯罪分子和反满抗日分子，既见不到文件也听不到报告，所以一无所知。金荣桂不是说不知道省心方便，不看不烦吗？可是，于不甘心省事，偏要找副厅长问问是怎么回事？请副厅长给他讲讲刑事犯罪和特务犯罪情况。副厅长说：“我讲不详细，让科长对

厅长报告吧。”刑事科长来报告时表示：“我以为关于刑事案件，副厅长已向厅长作过适当的报告，故我没有亲自向厅长报告，甚为惶恐！目下刑事犯罪没有发现特殊情况，我回去作一个扼要的材料给厅长送来，请厅长指教。”厅长问他：“发生过重大的抢劫案和杀人案没有？”他说：“没有”。厅长又问“有外地窜来的坏人吗？”他说：“没有发现。”厅长对他说“我在日本东京警视厅参观人家的犯罪搜查，采用的是科学方法，不用刑讯。你是警视厅出身的知名的刑事干部，注意部下，要废止刑讯，特别是酷刑拷打最不人道。”刑事科长非常尊重于厅长的意见，回去就作了一份刑事犯罪案的书面报告。特务科长来报告时说：“现在科里未检举任何重要事件，所有的案件副厅长都知道，我想以后副厅长必能按时向厅长作必要的汇报。今后厅长只要叫我，我就来，请厅长指教。”厅长说：“办案要慎重，把握人心要紧，要重证据，避免刑讯。我参观东京警视厅，我们要学习人家长处。听说你是宪兵军官出身，我很倚重你。我这个人好问事，请你不要误会。”他说：“厅长对我说什么我绝无误会，请厅长无保留地对我多加指导。”特务科长虽是个军人出身，但是他能说会道，对于表示要忠诚地尽他的职责。于对日系副厅长这一招，还真起了一点作用。从此，有关刑事案件的检举破案，刑事科长经常向厅长报告。而特务科的案件，特务科长总不愿意向厅长公开，因此于也不再过问。如震动中外的赵一曼被杀害的事件，于都不知道。解放以后于才听说，这正是在他的厅长任内。于说，溥仪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还管我作了向赵一曼烈士像请罪的忏悔。按理说不仅是赵一曼烈士的被害，是凡被害的烈士，我都有不可推委的责任，实在是罪孽深重！

有一次警察厅特务科把齐瑞璜逮捕了，齐是穆梭煤矿理事长，是金荣桂的朋友。齐为人忠厚消极，自“九·一八”事变

后在家闲住，以吸鸦片自遣。他的被逮捕对社会震动很大。齐家人找金厅长求助。金找特务科长关说，特务科长说这是绥芬河国境警察队办的。遂把办事人引见于金荣桂。那人说，这是我们要逮捕的要犯，明天早车就带回去。金欲令其取保，在外住一宿。那人说，厅长如亲自担保无误，亦未尝不可，否则不便。金当然不能以警察厅长身份为其作保。只好关照拘留所长把烟具拿进拘留所给齐过瘾。第二天把他带走了。以后听说是因为齐瑤瑋写信给穆棱煤矿长杜景芳买大烟土用暗号数字，好像要供应给抗日联军大批军械、服装似的，才闹出一场麻烦和误会。于听说后说：“这简直是笑话。”特务科常在特殊时刻，如伪建国节、伪皇帝巡幸等，实行所谓“检束”，大肆捉人，故意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警察乘机勒索，闹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对此种情况，于镜涛知道找特务科长难以奏效，他就面见特务机关长陈述说：“目前发生的事，使人心浮动，恐慌不安，给敌人以造谣煽动的机会，其后果不堪设想。警察厅有些人不听我的话，请机关长注意。”特务机关出面干涉，日本人是不敢违抗的。还有一次于听说特务科要动手逮捕工人，认为有共产党在煽动工人罢工，便立即到特务机关对机关长说明此事：“请机关长查明真相，别让他们惹起大问题来。”对这些问题，特务机关当然要认真对待。特务机关长认为于镜涛能及时反映情况，颇为赞赏。因为于的苦心经营，哈尔滨的中国人也少受了一些苦难。于说：“日本人什么都讲政策，并要把握民心，我就针对这两条想对策。举出证据来反驳他们的行为是不合乎政策；不能把握民心。”于还说：“特务机关长当然不能真信我的话，必然经过一番调查后才作决定，所以说对这些人打交道如同伴虎。”于平素对厅内中国人的骨干分子还是十分信任和倚重的。他不依靠这些人怎么可能办成一件事情呢？

伪首都警察总监

伪满首都警察总监这个职位，是中国人唯一最高的警察官吏。不过官越大越不管事。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官大无用，有事还得问部下。于镜涛说：“首都警察厅和哈尔滨警察厅一样，关于刑事和特务案件也不给总监阅览。我听人说关口副总监为人平和不生。到任后就和他作了坦率地交谈。”副总监本来是辅佐总监协助总监为办好警察事务而设的。于对关口说：“首都是天子脚下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不同于地方，至关重要。我二人必须同心协力把首都警察带好办好，属于纯警察事务就请你偏劳，如刑事特务检举搜查有关文件我也看不见，你看有需要我知道的就告诉我一些，以便掌握事态动向。关于满系重臣有关事项我多注意些，以便我二人互相策励，不使有所逾越。他到总监室，我也到副总监室主动地和他交谈、联系，有时还请他到我家便宴。所以我在首都警察总监期间，一切是比较顺心的。”

于说：“有一天于芷山治安部大臣（警察归治安部管）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他家里失盗了，叫我带人去看看。我当即带刑事科长、当管警察署长及两名办案有能力和经验的得力干部同赴于大臣公馆。由失物的主人——大臣夫人首先讲述了失盗的详情。据大臣夫人讲：‘我内室只有我的侍女常出入，我不在时由她守门，谁到内室来她可能都知道，请你们问问她吧。’所以在大臣和大臣夫人的面前开始询问侍女。侍女说：太太屋里的箱子柜都带锁，她从来也没有让我开箱子和柜，所以我也不知道那里头装的什么东西。那么多的箱子柜，也许忘记了所放的地方。太太疑心大，我是一个处女，不怕让医院检查。侍女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都发颤了。于大臣听到侍女的陈述，显得特别得意的样子。刑事人员征求大臣的同意打开了另一个箱子。在

里边竟发现了所丢失的物品。于大臣表示是夫人记错了，完全是误会。”

其实是大臣夫人怀疑大臣和侍女的关系。能在大臣家当侍女，当然不是一般的关系，即使这样，也得受她（他）们的肮脏气，那个世道，穷人真难过活呀！大臣夫人故造假案，想撵走使女，反而弄巧成拙，演出一场笑剧，闹得满城风雨！

于说：“首都警察有个特殊的任务：在伪皇帝出巡时担负卤簿的重责，保护鉴驾。溥仪喜欢出来游玩，他一出来就得搞警戒戒备，在我的任内，不知他出巡过多少次。”

约在1937年中，首警逮捕一名姓李（？）的中共党员，在长期拘留中获得特务科的信任，白天让他在科里服杂役，有一天降大雪，李乘机跑到对面的协和会，被小王（协和会机关杂志的编辑）给藏起来了。后来又人不知鬼不觉地把李打发走了。首警发觉李逃脱就让特务科把王逮捕了。小王是关东州（日本统治旅大等地时的称呼）人。小王的同乡如“满映”的姜兴，总理秘书室的鲁（我的同事）等人出头斡旋保释，我当时也曾托于向关口副总监说情，终于把小王释放了。王回家后托病死葬，以金蝉脱壳的方法跑掉了。这件事就在于的任内。

首都警察和别的警察一样也有所谓张霸天、滕蝎虎、王大巴掌等类的歹徒，在解放后被严惩，漏网者极少。

奉天省省长及国民勤劳部大臣

伪满省最多的时候有19省。于从省警升任滨江省长，即使是伪省长也算封疆大吏。滨江省会是哈尔滨，为于久居之地，任滨江省长，可以说是衣锦还乡，够得意的了。但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当大官没有实权，简直是牌位，一点儿生命力也没有。在于当省长的时候，五常县的农民曾向伪总理跪车上书请

愿。后来，这些农民的田地，被滨江省修水利，作为水没地全给收了（说换地或作价，可是迄未兑现）。收了以后，放之不用，荒芜了。农民见了心痛，请求发还，可是，办事人却置若罔闻，农民遂联名上书省长请愿，办事人故意封锁消息，不让省长知道。农民无计奈何，才到新京向伪总理大臣拦驾跪车上请愿，张景惠过问此事，才得以解决。

自日本于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伪满洲国所担负的战略基地的任务就更加重了。从开发矿产、修筑工事、挖煤炼铁到出人出粮。口头上说任务艰巨又重要，必须完成。压得人喘不上来气。滨江省为北满重地，出粮谷的任务尤重。弄得都市以豆饼糠子面充配给粮，种地的农民为出荷折腾得筋疲力竭。滨江省还是年年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嘉奖。于也被提升为奉天省特任省长。

奉天省（辽宁省）不但农产丰富，又是伪满的工业基地，鞍山是钢都，抚顺是煤都，本溪有煤铁公司，奉天市（沈阳市）内是兵工机械制造厂的所在地，为供给补充日本军国主义军用物资的要津。所以奉天省的重要性居伪满的首位。于说，我到奉天后仍然是个傀儡，不过是个活傀儡，也有想法，首先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又想日本人好像还重视我，不能光糊里糊涂，也假装积极主动地要求各工厂和各地进行视察加以鼓励。

于任奉天省长正是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虏获了许多美军俘虏，有的被收容在奉天省内的俘虏营。于同日伪中央人员去俘虏营视察过。他说，对美军俘虏的衣食住都不错，是按国际标准待遇的。他们跳呀、唱呀，毫不知愁。逢年过节给他们点酒喝，就更乐得不得了。他们信基督教，星期日作礼拜，祈祷战争早日结束，回国后作英雄。给他们酒喝，便受宠若惊，大肆谩骂美国总统。于说，美国兵很随便，内中也有官，不像日

本那样，官兵界限分的很严。也许是因为当了俘虏才这样？不过，他们都很乐观，不懊丧。

因为受太平洋战争影响，从时局着想，日伪决定把奉天省的各市，首先是奉天市的主要设施和军事工厂陆续向乡间疏散。按日伪中央部署，由奉天省作出切实可行的规划，逐步实行。这几乎成为奉天省的中心任务。这样一来，奉天省变为更加重要了。因此伪满中央决定起用一名大臣级的所谓大人物来担任省长。遂将充任过伪外交大臣，现任参议的韦焕章，特任为奉天省长，把现任伪满中央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源田松三调任为奉天省次长。仿佛把奉天省提升为中央一级格的省份了。就把于镜涛特任为新成立的国民勤劳部大臣。

伪满设立国民勤劳部的用意，极为明显，就想把伪满所谓的满洲国民都编成劳役的单位，准备有效地使其服劳役。什么矿山开发，挖煤炭炼钢铁和修筑军用工事，如铁路、码头、公路等，无一不从中国人抽出。工资低下，待遇极端恶劣。中国人是凡被派上劳工就如大难临头，九死一生，生还者极少。所以有钱人家捧上劳工就出钱雇人代去。穷人也得出劳工，而冒死应雇者不多。日本人匠心苦想拟找出一个妥善方法，摊派劳工。研究琢磨，把以往管理劳工的机构——国民勤劳奉公局升格为国民勤劳部专管劳役等事，美其名为国民勤劳部，其实就是劳役部。

伪满早就施行《国兵法》，适龄的男子均须受检，合格者一律服兵役。国民勤劳部成立后遂将其未合格者（残废病弱者除外），一律编为国民勤劳奉公队，按年龄顺序轮流抽出，经过教育训练后服劳役。管理这些事务的就是国民勤劳部。于镜涛担任大臣的这个部，建部后还没有办多少事，伪满就垮台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在改帝制这个措施时，自郑

孝胥以下的大汉奸都得到一笔5万至60万元不等的建国功劳金，总数为860万元，于是不是也得到了建国功劳金？于自己说没有得到。但于对“粮谷出荷”有成绩，得过奖金。据我所知，伪满给予镜涛叙过勋三位赐景云章，勋二位赐柱国章。此外，如建国纪念章、建国神庙创立纪念章、赤字社纪念章等，均属纪念章。于说，这是耻辱的记号，使我永生抬不起头来！

拟议中的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

1943年春，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辞职，日本竹下义晴中将（曾在哈尔滨特务机关、关东军任要职）、片仓参谋（关东军第四课长）欲推荐于镜涛继任。他们说，欲强化、充实华北，必须从满洲国引进有用人材。当时伪华北政局不稳，汉奸之间闹摩擦，情形复杂，张作相（是张作霖的把兄弟）想乘机出山做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政权受日军左右，故派张廷枢来伪满拟通过张景惠的斡旋，请日本人从中维持。张廷枢是张作相的次子，是张学良的同学，在旧东北军当过旅长，少年发迹，盛气凌人，动不动地不论是上级或同僚，总想拔尖，出人头地。在“九·一八”事变后，仍常凭自己的社会关系，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知道他底细的都不愿和他接近。日本人听说他投过延安红军，认为他朝秦暮楚靠不住，亦不肯与之接洽。他虽到伪满多日，往来于奉长之间，事事诸多掣肘，不能少展筹策。于镜涛虽亦从旁协助，但迟迟未奏效果。于镜涛拟请我同去华北，为其臂助。我二人一同分析了当时周围的有关情况，国际情势复杂，中国局势亦随之动荡不安。我们对华北人生地不熟，尤其治安军内部人员杂、派别多，我们在治安军里更没有可靠的中流砥柱，不便施展，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国势不如从前有力可靠，很明显，我们去了不容易打开局面，所以前途渺

茫，毫无把握。不如仍守原地，省心无虑。况且张作相既不能就任委员长，我们就更缺乏依靠力量。松本益雄也不积极支持和劝驾。于镜涛最后决定不去华北就职。于是轰动一时的华北之行眨眼间已成过去。

“八·一五”光复前后

1944 年秋，报载效忠希特勒的法奸被法国人民惩处的消息，这对伪满的汉奸震动很大。特别是在 1945 年 5 月法西斯德国彻底完蛋以后，人们都感到日寇的覆灭已成定局，不过时间问题。而日寇在垂死挣扎，还恬不知耻地散布什么最后胜利非我莫属的谎言。美国 B29 型轰炸机却日益频繁出现，张景惠所说的“福地长春”这一套鬼话，再没有人相信了。

日寇是外强中干，怎么打扮也掩饰不住其内心的空虚。日本舰队在太平洋战争中全军覆灭，陆军几乎全开到侵华战场，其国内已陷于极端贫困。东条下台，小矶、米内虽出组联立内阁，亦苦无善策，继又下台。铃木贯太郎任首相后即于 1945 年 5 月召开的一次大陆会议上向伪满和伪南京政府等发出请好自为之、各自善处的通告。伪满之策应时局于 1945 年 7 月 1 日对首都新京特别市的机构作了调整和强化。特任国民勤劳部大臣于镜涛兼新京特别市长，提拔警务司保安科长赵万斌为简任警察总监。将原任市长张联文和原任首都警察总监齐知政均转任为总务厅参事官。这个任命是在当时伪满政府公报上发表的。事先张景惠（伪总理）和武部六藏（伪总务长官）召见于镜涛，面授机宜，宣示倚重之意。大意是：鉴于时局紧迫，经国务院请准皇上特任阁下兼新京特别市长，责任重大，希善体宸衷，不负众望等情。于镜涛说，当时也觉得受宠若惊，很感兴奋，表示愿尽全力以负重托。当时在新京周围，有日军一个师团兵力，

再加上伪满军警，一时尚可苟安。惟自波茨坦宣言发表后，于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市投了一颗原子弹，20万人顷刻丧命；9日又在日本长崎市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其状更惨！苏联又乘机对日宣战，时局则急转直下。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皇帝以及其他所谓日满要人，于8月11日凌晨乘火车由长春东站出发悄悄地去通化大栗子沟避难。决定以武部留守新京由于镜涛等襄助。

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宣读了停战诏书，也就是对英美中苏四国宣告了无条件投降。于镜涛说，因为我是中国人心中非常激动，中国胜利了，全国欢腾！而我是历史上的罪人，作了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可是，回想起当年蒋介石和张学良曾派人授意张景惠让他对日本人善自应付以待将来，即所谓曲线救国。我曾为此事尽过犬马之劳。因此，我想或许能得到国民党当局的谅解。这好像已陷入深渊绝境，又抓着一根稻草，弄好了，还有一线活命的希望。

长春在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尚未来接收这一段期间，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对横行霸道的日本人和靠日寇势力作威作福的为非作歹的警察、特务、宪补等人恨之入骨。有些坏人都藏起来了。长春市在光复后，除了难以避免的一些小问题外，并未发生惊人的大事件。张景惠等于8月18日由大栗子沟回长春后，纠合其它伪满所谓要人，——据说是按蒋介石的命令——成立了地区性的（伪满范围的）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张景惠任委员长。长春市亦成立了临时治安维持会。将原长春市公署进行改组成立了长春市政府，于镜涛仍任市长。当时于本不想再作冯妇，怎奈在东北沦陷时，尚肯为日寇效命，而今日祖国光复，宁能坐视不理？是以待罪之躯，勉肩重任，以期在中国政府接收之前，负全责维持地方治安，确保人民生命生活之安

全。不料苏军进驻长春，将于逮捕，带到苏联。在苏联伯力俘虏营住了将近5年，于1950年夏由苏联遣返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待罪反省。于1962年特赦回长春。（下略）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

伪满司法部大臣张焕相

张辅麟

一、他被捧为“敬神家”

1940年5月，傀儡皇帝溥仪奉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之命，第二次去日本访问，专门把天照大神“请”回来，当作伪满的“建国神”供奉在新修的“建国神庙”里，并称日本为父母之国的“亲邦”，不折不扣地当了儿皇帝。此后，敬神之风风靡一时。在此风中有一个人大出风头，他就是伪司法部大臣张焕相。因为早在1937年，张焕相带头，首先在抚顺修了神社，被日伪当局尊为“敬神家”而名噪一时。其实他所搞的那一套，只不过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导演的一场改换祖宗丑戏中的开台锣鼓罢了。

1937年8月，张焕相决定在自己家乡抚顺新屯南山动工修建日本神社。他自己掏腰包花了伪币4500元，还由伪县长及县里各有关人士组成“氏子委员会”，筹划修建事宜。费时两个月，修成后供奉日本神武天皇，专门搞了一个镇座祭，邀请伪满军政要人前去参加，还组织小学生每人栽一棵树以作纪念。当时《满洲日日新闻》拍照报道大肆宣传，颂扬张焕相的“敬神”美